

关于“普通话”与“普通话之乡”的考察

闵庆万*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

本研究主要基于对河北滦平方言的实地考察和现有材料中有关北京话的记载, 对比和分析两种方言的共时语音体系和历时语音演变特征, 同时综合“普通话”这一称说方式的产生、演变及其内涵和外延等方面的讨论, 重新思考河北滦平被称为“普通话之乡”是否合理? 通过讨论, 本研究认为滦平是“普通话之乡”的表述不够准确, 也缺乏实际依据。如果继续将滦平称为“普通话之乡”, 则十分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对普通话概念的误解, 综合考虑, 本文建议将其改为“普通话采集点”。“普通话之乡”这一“不适当的概念”之所以延续至今并不断扩散, 一方面和当地民众缺乏专业知识, 同时有关部门并未及时纠正相关, 另一方面也和学界至今没有明确“适当的概念”, 也没有做好推广普及工作相关。

关键词: 普通话, 普通话之乡, 北京话, 滦平方言, 音韵比较

* 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研究所责任研究员。

A Study on “Putonghua” and “Hometown of Putonghua”

MIN Kyungman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Putonghua” again, focusing on the fact that Hebei Luanping region is called “Hometown of Putonghua (普通话之乡)”, and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phonological systems of Beijing dialect and Luanping dialect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fter the discussion, it was discussed whether Luanping was suitable for the nickname “Hometown of Putonghua”. Considering the concept of “Putonghua” described in this text and the linguistic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Beijing and Luanping regions, the expression “Hometown of Putonghua” by Luanping lacks a reasonable and practical basis, and at least this It is not considered to be a clear way of expression. Therefore, continuing to refer to Luanping as “Hometown of Putonghua” is likely to only further spread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concept of Putonghua, so changing it to “Putonghua collection point (普通话采集点)” is considered as a more appropriate expression.

Keywords: Putonghua, the hometown of Putonghua, Beijing dialect, Luanping dialect, phonological comparison

一、前言

“普通话”这一术语在中国诞生的时间并不算晚,其经历了 20 世纪初期的“复合性”阶段到 20 世纪中期相对明确而统一阶段的转变。该术语在民间流传的时间较长,但其内涵和外延却偏离了最初政府和学界的界定。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和学界虽然成功地普及了普通话,但是对于“普通话”这一概念的普及却不到位,同时也缺少对“普通话之乡”的共时语音面貌和历时语音演变特征方面的关注,由此形成了“以讹传讹”的现象。

1953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曾两次组织和派遣专家团队到滦平县采集普通话标准音,自此以后,滦平县就被冠以“普通话之乡”的称号,这也成为滦平县最重要的宣传广告。¹

目前有关“普通话之乡”的研究还并不多。闵庆万(2021)对滦平进行实地考察,并将其与前贤所记录的北京话语音面貌进行对比、分析。本文首先对“普通话”的概念进行重新思考,同时结合调查所得的一手材料,对滦平方言和北京话的异同点进行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综合讨论滦平被称为“普通话之乡”有怎样的不合理之处。

二、普通话的概念

“普通话”的概念可以 1955 年这个时间点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北京话的地位开始站稳脚跟的清末开始至 1954 年间,后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1955 年正式宣布普通话的概念。

(一) 1955 年以前

在中国,“普通话”一词仅有 120 多年的历史。1902 年吴汝纶在《东游丛录》中介绍了日本人使用“普通语”这一名称。1906 年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自序》

¹ 百度上显示,滦平方言是汉语普通话发音的标准。(检索于 2022 年 4 月 2 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A6%E5%B9%B3%E5%8E%BF/7429142?fromtitle=%E6%BB%A6%E5%B9%B3&fromid=565063&fr=aladdin>) 滦平县多个村口摆放着一块刻有“普通话之乡”字样的大石碑,其中一块立于下甸子村的村口。

中也曾使用过“普通话”的名称。²从广义角度上看，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都曾被举为“普通话”的代表，并且“普通话”这一称呼在不同时期也并不一致。现代标准汉语（汉民族共同语）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才被称为“普通话”，明朝至清末以前被称为“官话”，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则被称为“国语”等。如果仔细探究这些名称的含义，则会发现彼此之间并不完全吻合。

明清时期在全国有一种通用的“通语”，它是不同方言地区的人们在一起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官话”。³当时的官话并没有明确的语言规范⁴，主要用于管理或者商人之间使用。（蒋绍愚，2019，页 67；苏成培（主编），2010，页 68）同时期“官话”一词也被指掺杂说话者北京口音的语言，由此也被称为“蓝青官话”。⁵

最先提出“国语”一词的人也是吴汝纶。1902 年，他前往日本视察日本的教育，将国语的概念引入并记录在《东游丛录》中。《上张管学书》中也使用了“国语”一词。⁶此后，“国语”这一名称的使用开始逐渐增加。吴汝纶在目睹了日本普及“国语（东京话）”的情况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到中国以后，提倡“统一国语”，并且提议普及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

1909 年清政府将“官话”改为“国语”。1921 年胡适在《国语运动的历史》中提到以下内容：

“所谓国语，是指从长城到长江，从东三省到西南三省，这个区域里头大同小异的普通话。”（姜义华，1993，页 309），“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何九盈，2007，页 125）

² 《东游丛录》：“今年春仆曾游萨摩，见学生之设立普通语研究会者，到处都是。所谓普通语者，即东京语也，故现在萨摩人殆无不晓东京语者。”（吴汝纶，2002，页 798）；《江苏新字母·自序》：“余学普通话（各省通行之话），虽不甚悉，然余学此时所发之音，及余所闻各省人之发音，此字母均能拼之，无不肖者。”（朱文熊，1957，页 1-2；李宇明，2003，页 4）

³ “官话”一词出现在明朝，通常译为“Mandarin（曼达林）”。

⁴ 赵元任（1961）最先开始尝试规定音素（万一不是语音）的发音标准，其成果体现在 1919 年正式发行的字典《国音字典》中……在此之前，中国历代的朝廷从未正式定义过标准口语（Chao, Yuen Ren, “What Is Correct Chinese?”（1961））。平田昌司（2016）根据朝鲜壬午军乱之后撰写的《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1882）推测，最早要求朝廷调整清朝末期口语标准化的人是马建忠（1845-1900）（平田昌司，2016，页 230）。

⁵ “蓝青”的表面意思是说“既非纯蓝，亦非纯绿”，意指“不纯”（史皓元，2016，页 5）。

⁶ 《上张管学书》：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如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958，页 29；李宇明，2003，页 5）。

1925 年, 钱玄同在《理想的国语》中阐述到:

“适之先生的见解, 比前派自然要高明得多多了。他因普通话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 所以主张认它为国语, 把它推行出去, 这确是很有道理的见解。但我觉得尚有未尺。我以为以普通话为国语的主干, 则可; 国语而限于普通活, 则不可。述有, 这里所用‘普通’一词是很模糊很含混的, 所以我们使用普通话, 只可‘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⁷普通话就是官话。官话本出于元朝的北京话……官话虽然号称普通话, 通行的区域很广, 然而夷考其实, 是全无标准的。我们简直可以说, 凡官话都是‘蓝青官话’。惟其如此, 所以在实际上, 说到官话, 大家都隐隐以北京话作为标准, 某人能说得一口好北京话, 大家便赞他官话说得好。实际上既然如此, 则我说以北京话为国语的主干, 既无异于说官话(或普通话)为国语的主干。”(钱玄同, 1999, 页 226-228)

综合以上几位的观点可以看到, “普通话”一词比“国语”一词出现得时间更早。当时认为普通话就是官话(蓝青官话), 应该把这个普通话作为国语的主干。何九盈(2007: 125)指出: “到 20 年代下半期, 确立了以‘京音’为‘国语’或‘普通话’的标准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北京音和‘普通话’的关系的确‘统一起来’了。可人所共知, 当时的正式文书和相关机构都是以‘国语’命名。‘国语’和‘普通话’这两个概念已有在朝与在野之分, 地位上也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别。”当时认为国语是由政府建立并用于正式场合使用的语言, 而普通话是用于民间, 属于通用的非正式语言。

中国学界在 1955 年以前, 即在新定义出现以前, 一直把“普通话”看做“蓝青官话”。

根据林焘的《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 普通话一般指不地道的北京话, 即蓝青官话(林焘, 1955, 页 4)。各地的蓝青官话虽然实际上是以北京话为基础, 但是由于掺入了自己地区的方言成分, 而这些成分又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因此很难找到一定的标准。

何九盈认为这个时期的普通话可以总结为是“蓝青官话”, “南腔北调的普通话”, “包含自己方言成分太多了些的普通话”, “拿北方话做底子的普通话”。他主张在中国语言学历史上, 很多概念都需要重新梳理, 模糊不清的情况相当严重, 所谓的“官话”、“普通话”、“国语”等都存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 1950 年代初着手实施汉语规范时也曾出现过, 重要概念的含义和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当时就如何定义普通话、北京话、标准语等, 以及他们之间有什么

⁷ 原文出自《周易·系辞上》。

么关系曾展开了争论（何九盈，2007，页 121-126）。例如，王力在《论汉语标准语》中指出：“论证的焦点在于用北京话作为标准语言呢，还是用普通话作为标准语。”（王力，1991，页 56）罗常培和吕叔湘认为：“解放以后，民族共同语的要求提到了日程上来，语言学者中间展开了关于共同语标准的争论，主张拿北京话做标准的同志们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说，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以一定的方言为基础的……主张拿普通话做标准的同志们说：能说北京话的人不多，能说普通话的人却很多。”（罗常培、吕叔湘，1955，页 5）此外，鲍明炜主张：“现在大家对汉民族共同语是否已经形成的问题，意见还不完全一致……这个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是什么呢？是北京话呢？还是普通话呢？大家看法不同，于是也发生了争论……所谓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不过是现代汉语在语音上向着北京话集中的必然过渡现象而已……要是从发展上看，两者应该是一个东西。”（鲍明炜，1955，页 3-4）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基本明确，1955 年之前对于普通话的定义并不清晰，只是不同地区（除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均采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官话）。此外，当时所说的“普通话（官话）”含有大量的地方方言成分，具有不统一、不完整以及过渡时期的特点。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有关标准语标准的建立并不明确。

（二）1955 年以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 1955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决定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名称从“国语”变更为“普通话”，从此开始正式使用“普通话”这个名字。这次会议在就标准音的再评选交换意见后，最终通过了决议，敦促“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三天后，《人民日报》在决议基础上发表了如下社论：

“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⁸

紧接着，国务院于 1956 年 2 月 6 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并增加了语法的范畴。

“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⁹

⁸ 1955 年以后，从普通话的定义开始，“北方方言”正式登场。

⁹ 王力在评价说，与之前的决议案相比，《指示》给普通话下了“更加明确”的定义（王力，1991，页 86）。

《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定义较为简单易懂, 但该定义在颁布前历经了相当漫长和曲折的过程。普通话的定义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 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的意思是指北京话的语音体系, 并不是意味着北京话中的所有语音现象都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林焘, 2000, 页 31)。《指示》赋予了普通话正式和规范的概念, 这是当今中国最常用的国家语言标准的定义。以这一定义的出现为准, 普通话在中国作为国家标准语言的地位得以巩固。可以说, 正是由于明确了以北京语音作为国家标准音的地位, 并将其与之前普通话所具有的复合性含义进行了区分, 才建立起了新的定义。由此可以说, 20 世纪初吴汝纶等所提倡的“统一国语”是在 20 世纪中期经由《指示》普通话具备了规范以后才正式开始的。

据史皓元(Richard VanNess Simons, 2016, 页 6-8)的主张, 虽然很多人认为北京话成为口语的标准已经有几个世纪了, 但是实际上, 人们从真正意义上认可北京话作为国家的标准语言, 并且普遍接受这一看法其实是相当晚的事情, 因为直至二十世纪 50 年代, 北京话才正式确立了作为国家标准语言的地位。此外, 西方学者们广泛推崇、热烈反映的事五声调南系官话, 却鲜少这样对待北京话, 曾晓渝(1991)对明代 18 种韵书和韵图进行了比较分析, 也发现其中只有一种反映了北京语音的四声体系。¹⁰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以为北京话自 1421 年明朝移都北京时便成为了中国的权威方言, 而南音的影响则在 1644 年满人入关后彻底消失了, 但也有不少与此相左的观点。李新魁指出, 直至清朝中叶以后, 北京语音才登上汉语共同标准语的地位(李新魁, 1980, 页 44)。蒋绍愚则认为至少是 1860 年前后北京话才成为官话形成的基础(蒋绍愚, 2019, 页 67)。另外, 柯蔚南认为, 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北音, 较之于以南京官话为正统的南音, 历来居于次位,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South Coblin, 2000)。白莎亦指出, 北京方言直到 18 世纪的乾隆年间才开始真正与南系官话相匹敌, 而非明朝。但由于允许两系官话并行, 北京方言始终无法取得正统地位(Kaske, 2008)。而南系方言则保留了很多北系官话中也已消失的语音特征¹¹, 从而能够以古音嫡传的优势, 挑战北京方言的权威(史皓元, 2016, 页 7)。

林焘认为语音规范不能抛开北京音系(林焘, 1955, 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当时在选定标准音时有很多意见。李荣的《普通话与方言》也梳理了这些意见, 并指出:“总而言之, 普通话拿北京话做底子,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是七百年来历史的选择, 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是事实上公认的, 不是谁谁谁的爱好。”(李荣, 1990, 页 322)这几句话虽然在当时也考虑过其他地区的语音, 但

¹⁰ 这里所说的 1 种是徐孝著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

¹¹ 赵元任(1961)表示:“官话意义的下降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 大部分是与北方语音的较快发展、中古时期音类区分的丧失有关”, 并以入声的消失、尖团的消失和清浊的消失等为例。(赵元任, 2002, 页 838-839)

出于对历史的重视，全国公认的标准语“选择”依旧是北京话。可以看到，李荣所强调的是所谓的北京地区的历史性，而不是北京话的语言地位。

目前普通话在词汇方面包含了很多其他方言的词汇，在语法上也受到了其他方言的影响。¹²从整体上来看，普通话虽然是以北京话为基础，但包含了其他地区的方言、古语以及外来语成分。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明确，北京话作为国家标准语（共同语）的地位最晚是从19世纪开始正式确立的，直到20世纪中期才完全确立。郭锐指出“由于受普通话的巨大影响，北京话近四十年来变化迅速，不少词汇、语法现象正在消失。”（郭锐，2018，页9）普通话与北京话必然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作为标准语和共同语的普通话，影响力则更大。北京虽然是历史悠久的首都，但是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因此显示出向普通话倾斜的趋势，也自然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总而言之，目前看来普通话和北京话是不一样的，今后也十分有可能扩大差距。究其根本，普通话具有规范性，使用范围广，而北京话没有固定的规范，使用范围也十分有限，因此北京话十分有可能在其后的发展中呈现更多情况。

三、北京话与滦平方言的比较

本节将比较和分析北京话（老派）和滦平县下甸子村在共时语音面貌和历时语音演变两个方面的异同点。

《指示》中作为普通话语音基础的北京话，其次是于1953年展开过标准音调查的滦平县的下甸子村。当时总共在滦平县的金沟屯镇、巴克什营镇和火斗山镇进行过调查，而下甸子村是隶属于金沟屯镇的13个村之一¹³，本文将滦平县下甸子村方言称为“滦平方言”。

滦平方言和北京话都属于北京官话京承片怀承小片（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城市大学，2012）。滦平县在行政区域划分上隶属河北省承德市，总面积为2,993平方公里，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距北京市（二环）约有165公里，是连接北京市和承德市的中心点。截至2020年，滦平县的常住人口为26.8万多人。¹⁴

¹²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普通话融入了很多粤语词汇，例如：买单，收银台，靓丽等（蒋绍愚，2019）。

¹³ 金沟屯镇目前辖下甸子、金沟屯、滦河沿、三道湾、下瓦房、丁营、梁后、下营、大黑沟、柳家台、云盘山、大杨树沟门、荒地13个行政村。

¹⁴ 检索于2022年2月10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A6%E5%B9%B3%E5%8E%BF/7429142?fr=aladdin#6>）。滦平县除了汉族以外，还居住着满族、回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虽然当地还保留着一些来源于满语的地名，但是现在该地区的少数民族都说汉语，从语言上已经很难对各个民族进行区分了。

有关北京话, 本文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8 日进行了为期 11 天的实地调查, 发音人信息如下:

1. 高国森, 男, 汉族, 1948 年出生(当时 71 岁), 北京西城区人, 退休, 公司职员, 大专学历, 一直居住在当地。主要说北京话, 会普通话。
2. 王金鹏, 男, 汉族, 1953 年出生(当时 66 岁), 北京西城区人, 退休, 公务员, 中专学历, 一直居住在当地。主要说北京话, 会普通话。

有关滦平话, 本文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30 日进行了为期 19 天的实地调查。发音人信息如下:

1. 鲍玉忠, 男, 汉族, 1950 年出生(当时 69 岁), 滦平县下甸子村人, 退休, 小学教师, 中专学历, 一直居住在当地。主要说滦平方言, 会普通话。
2. 张云龙, 男, 汉族, 1954 年出生(当时 65 岁), 滦平县下甸子村人, 农民, 初中学历, 一直居住在当地。主要说滦平方言, 会普通话。

本文分析的单字总共有 3,580 多个常用字。其中大部分的文字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方言调查字表》中。虽然有些字不在《方言调查字表》中, 或者音韵地位有所不同, 但是也可以在《广韵》和《集韵》中查找到。本文使用国际音标标记发音。接下来本文将对北京话与滦平方言的声母、韵母以及声调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分别进行对比分析。

在阐述两地方言的比较部分, 引用并参考了《河北承德方言语音研究》(闵庆万, 2021, 页 112-115), 进而对共同点与不同点进行了重新整理与说明。

(一) 共同点

1. 声母

北京话与滦平方言声母的共同点概括如下。

- ① 声母的个数为 22 个
- ② 古全浊声母均清化
- ③ 古知庄章组字大部分读成组声母 [tʂ], 古精组遇到洪音字时读成组声母 [tʂ]。
- ④ 没有尖音和团音的区别
- ⑤ 轻唇和重唇互不相容
- ⑥ 古来母和古泥娘母不相互混合
- ⑦ 止撮开口三等字读成零声母, 非止撮开口三等字读成声母 [z]。
- ⑧ 古见晓组开口二等字大部分被腭化

北京话和滦平话都有 22 个声母 (p p^h m f t t^h n l ts ts^h s ts̥ ts̥^h ʂ z tɕ tɕ^h ɕ k k^h x ∅)。两地在声母个数、发音方法 (manner of articulation) 和发音位置 (place of articulation) 上基本没有差异。

古全浊声母在今北京话和滦平话中都依据声调的平仄发生了分化, 来自古平声的塞音、塞擦音今读为送气清音声母, 例如**盘並**, **田定**, **全从**, **肠澄**, **穷群**等字的今声母分别是: p^h, t^h, tɕ^h, ts̥^h, tɕ^h; 来自古仄声的塞音、塞擦音声母今读为不送气清音声母, 例如**肚~子**, **定**, **步並**, **独定**等字的今声母分别是 t, p, t。

两种方言里来自古知庄章组和古精组的洪音字, 今读音比较稳定。北京话中知庄章组字大部分读[tʂ]组声母, 精组遇到洪音字时读成[tʂ]组声母。只是, 部分知庄组字读成[tʂ]组声母, 部分精组字读成[tʂ]组和[tʂ̥]组。滦平方言的情况也基本上和北京话一样。

两种方言里古精组字声母和古见晓组字声母在今天的细音前, 全部读成[tɕ]组声母。即, 没有尖音和团音的区别。例如, **酒精**和**九见**读成[tɕ]声母, **清清**和**轻溪**读成[tɕ^h]声母, **羨邪**和**现匣**读成[ɕ]声母。

两种方言里古非敷奉母字被读成[f]声母, 古微母字被读成零声母。即, 轻唇和重唇互不相容。例如, 把**非非**, **副敷**, **饭奉**读成[f]声母, 把**望微**读成零声母。

古来母和古泥娘母在今天的北京话中, 声母不相互混合, 来母字读成[l]声母, 泥娘母读成[n]声母。滦平方言的情况也基本上和北京话是一样的。例如, **離~别**、**来**, **老来**, **蓝来**读成[l]声母, **泥泥**, **脑泥**, **南泥**读成[n]声母。

古日母字可以分为止撮开口三等字和非止撮开口三等字来进行说明。首先止撮开口三等字在北京话和滦平方言中都读成零声母。非止撮开口三等字在今天的北京话中全部读成[z]声母, 滦平方言基本上也是如此。例如, **儿**, **而**, **耳**, 二读成零声母。如, **软**, **日**, **让**读成[z]声母。

古见晓组开口二等字在今天的北京话和滦平方言中大部分被腭化。例如, **家见**, **交见**读成[tɕ]声母, **巧溪**读成[tɕ^h]声母。

2. 韵母

北京话与滦平方言韵母的共同点概括如下。

- ① 韵母的个数为 38 个
- ② 四呼均具备
- ③ 阳声韵读成[n], [ŋ]韵尾
- ④ 入声韵舒化

北京话中总共有 38 个韵母 (ɿ ʅ i u y a ia ua ɤ ie ye o uo ɛr ai uai ei uei ou iou an ian uan yan ən in uən yn aŋ iaŋ uaŋ əŋ iŋ uəŋ iuŋ uŋ)。滦平方言中也有 38 个韵母, 但与北京话不同的是, 在北京话中与声母 [tɛ tɛ^h ɕ ʈ] 结合的 [iuŋ] 韵母在滦平方言中读成 [yŋ] 韵母。

北京话和滦平方言的韵母均具备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和撮口呼。这两种方言的阳声韵中各有 [n], [ŋ] 两个韵尾。在北京话和滦平方言中, 咸深摄的舒声字与山臻摄的舒声字合并, 读成 [n] 韵尾, 宕江曾梗通摄的舒声字则读成 [ŋ] 韵尾。例如, 贪咸, 滩山, 民臻读成 [n] 韵尾。帮宕, 棒江, 等曾, 兄梗, 胸通读成 [ŋ] 韵尾。北京话与滦平方言没有入声韵。中古入声韵在两种方言中合并为相应的阴声韵。

3. 声调

北京话与滦平方言声调的共同点概括如下。

- ① 古平声字分为阴平和阳平, ② 古次浊声母上声字读成上声。
且声调有 4 个。
- ③ 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读成去声。 ④ 古次浊声母入声字大部分读成
去声, 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大部
分读成阳平, 古清声母入声字
分为 4 个声调。

北京话与滦平方言中的古平声字分为阴平和阳平, 各自有阴平 (55)、阳平 (35)、上声 (214) 和去声 (51) 4 个声调。

在这两种方言中, 古次浊声母上声字在今天仍然读成上声。例如, 马明, 武微, 努泥, 冷来, 忍日, 眼疑, 永云, 养以读成上声。

这两种方言中的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在今天被归为去声。例如, 倍並, 父奉, 道定, 坐从, 赵澄, 士崇, 近群用去声来读。

如表一所显示的, 北京话与滦平方言中的古入声字在今天的声调归属情况是大致相似的。

表 1: 北京话与滦平方言古入声字声调的归属比例表¹⁵

	古次濁入				古全濁入				古清入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北京	4.4	2.6	0.9	92.1	3.5	76.5	3.5	16.5	37.2	16.2	11.5	35.1
滦平 下甸子	6.9	3.9	4.6	84.6	8.6	70.5	6.5	14.4	33.7	21.6	19.6	25.1

在北京话中，古次浊声母入声字在今天大部分都读成了去声，只有部分文字读成阴平、阳平和上声。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在今天大部分读成了阳平，少数读成了去声，只有部分文字读成了阴平和上声。滦平方言虽然与北京话几乎相似，但是将古次浊声母入声字读成去声或者将古全浊声母入声字读成阳平的比例稍低。相反，将古次浊声母入声字读成阴平、阳平和上声的比例以及将古全浊声母入声字读成阴平和上声的比例稍高。北京话中的古清声母入声字在今天分别归属于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其中归属于阴平和去声的相对较多，归属于阳平和上声的相对较少。滦平方言的情况虽然与北京话几乎相似，但是归属于阳平和上声的要比北京话多。相反，归属于阴平和去声的要比北京话少。

（二）区别

北京话与滦平方言的区别在声母和韵母各有一个突出的方面。

古影疑母开口一二等字在北京话中读成零声母，而在滦平方言中读成[n]声母。例如，北京话中将蛾，饿，熬，岸，安，肮，额，挨，矮读成零声母，而在滦平方言中则读成声母[n]。

古泥来母合口字在北京话中全部读成合口呼韵母。但是在滦平方言中的部分泥来母合口字中，合口呼的介音则消失了。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山摄和通摄中。例如，滦山，乱山，弄通，农通的北京话读音分别为 $luan^{35}$ ， $luan^{51}$ ， $nuŋ^{51}$ ， $nuŋ^{35}$ ，而在滦平方言中的读音分别为 lan^{35} ， lan^{51} ， $nəŋ^{51}$ ， $nəŋ^{35}$ 。¹⁶

¹⁵ 在本文的古入声字声调归属比例中所使用的汉字在两种方言中并不完全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区的方言提供者所知道的汉字量不尽相同。在本文中，虽然从两地收集到的资料的数量不一致，但是由于数量并不太多，因此认为在阐述古入声字声调归属的大体情况方面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¹⁶ 下甸子地区的人们（老年群体）主要把滦平说成“[[lan³⁵p^hiŋ³⁵]]”。

四、总结

在中国, 标准语(共同语)的来源历史悠久, 其名称历经了“官话”和“国语”等阶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正式命名为“普通话”。如果说当时的官话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并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的共同语的话, 那么由政府制定规范确立的现在的普通话, 则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人们所使用的标准语和共同语。本文对普通话的概念按时间顺序分成了两个阶段进行探讨。如果说 1955 年以前对普通话的概念和标准还尚不明确的话, 那么 1955 年以后则在普通话的新定义中明确了普通话的本质特征, 同时也明确规定了普通话语音的标准是北京语音, 且这一定义一直沿用至今。

1953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了专家组, 派遣专家团队到滦平收集普通话标准音。这项调查成为了后来滦平被称为“普通话之乡”的主要(或者唯一)依据。对此, 本文利用实地调查资料, 分析和比较了北京话和滦平方言的语音特征, 发现这两种方言的音韵体系有很多的共同点。其中声调的共同点最多, 其次是声母和韵母的共同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并不是只有滦平方言才具有与北京话相同的特点, 在其他的北方方言中也常能看到。即, 北京话与滦平方言的共同点也可能是北京话与其他北方方言的共同点。¹⁷

据林焘介绍, 从东北地区到北京这个辽阔的官话地带(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 河北省东北部的围场以及承德一带), 各方言的音韵体系十分相似, 声调分类完全相同, 调值也非常近似(林焘, 1987, 页 161)。因此可以肯定地说, 两种方言应该属于同一方言区。两种方言在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方面也有两个共性: 一个是民族的长期混居; 另一个是人口的不断流动。从历史上来看, 承德地区是游牧民们频繁出入的地方, 因此承德地区的居民结构也一直在变化。戴克良和成福伟分析过, 明朝时期, 承德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属于无人居住的“无人区”。(戴克良、成福伟, 2014, 页 53-55)即使清初时期蒙古人曾经居住在那里, 但是在清代中叶, 大量带有京腔的满洲人移居到那里, 成为了承德地区的主要居住人员, 而这也正是判断承德方言成为隶属于北京官话的直接原因。

研究滦平县的专家们(董立龙等, 2018)对“普通话之乡”的看法是:“滦平的语音比那时的北京话稍微硬一些, 但是更加直接、清楚和明确。特别是没有北京胡同的儿化、省字和尾音等发音习惯, 更加容易学习和推广。”《指示》中所说的将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的意思是以语音体系(辅音、元音和声调的构成要素)为标准进行衡量, 而不是以语音体系主要成分之外的特征来确定普通话的语音标准。本文中有关滦平县之所以被称为“普通话之乡”的原因, 除了于 1953 年所进

¹⁷ 如果包括词汇和语法的话, 北京话与滦平方言的差异就会增多。例如, 词汇部分, “乡村”被称为“营子”, “去世”被称为“憋儿古”。语法部分, “这个东西拿得动”可以说成“这个东西拿动了”, “这个东西拿得动吗?”被说成“这东西拿动了吗?”。

行的两次实地调查之外，并没能找到其他的依据。而且，当时专家们前往滦平调查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收集那个地点的方言来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而是为了确定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参考了当地的方言。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想把滦平县的方言作为共同语的语音标准的话，那么必然也会考虑到历史层面。即使不进行比较，也可以轻易地知道北京和滦平这两个地方在历史地位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更何况，从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在为制定标准语的众多会议当中，都没有发现滦平县有被正式地提及过的记录。

因此，综合考虑本文中所阐述的“普通话”的概念，北京和滦平县的语言和历史等方面，滦平是“普通话之乡”的表述缺乏合理性和实际依据，或者至少可以看出这个表达方式并不确切。所以，继续将滦平称为“普通话之乡”，只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对普通话概念的误解，因此建议将其改为“普通话采集点”更为恰当。那么，真正的“普通话之乡”在哪里呢？如果以《指示》中的定义为标准的话，恐怕很难指定是哪一个具体的地方。从语音的特点来看，由于有明确表示北京语音是普通话语音的基础，因此北京可以被指定为“普通话之乡”。但是如果将范围扩大到词汇和语法上的话，也许可以是所有使用北方方言的地区。¹⁸

或许直至 20 世纪中期，仍然存在着普通话概念的不统一也未可知。至少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普通话的概念看起来并不像政府和学界所规定的那样规范。¹⁹这可能是因为只有极少部分的中国人直至升入大学以后，在上现代汉语课的时候才能够正式接触到普通话的标准概念。²⁰罗常培和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表示：“我们现在应该‘批评’在‘普通话’的名称中错误地添加不正确的概念，恢复‘规范的民族共同语’的概念。”随着“普通话之乡”这一别称的不断扩散，2013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甚至还授予了滦平县全国唯一的“普通话体验区”的称号（罗常培、吕叔湘，1955，页 5）。目前，有关滦平县被称为“普通话之乡”的说法，部分学者觉得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他们可能会单纯地认为这只是一般民众出于不了解而产生的现象，并不是大家故意为之的。可以看到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析尚未完全实现罗常培和吕叔湘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批评”与“恢复”。从滦平被称为普通话之乡这一事件来看，所谓的“不正确的概念”，与其说是一般民众误用或随意使用，不如说是因为有关部门没有纠正“不正确的概念”，并且学界也没有阐明“正确的概念”，因此为什么这种错误的认知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得以扩散，就显得十分合理了。

¹⁸ 如果将历史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话，那么把北京选为“普通话之乡”则更加会得到认可。

¹⁹ 北京和滦平的方言提供者都认为自己地区的话是“普通话”。钱玄同所提到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情况，即使在今天也仍在发生。

²⁰ 最近，在中国高中的选修课《汉语汉字专题研讨》（温儒敏，2021，页 63）中记载了普通话的概念，“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

参考文献

- 鲍明炜 (1955)。论汉族共同语的形式和发展。《中国语文》, 期刊卷数页数皆不详。
- 戴克良、成福伟 (2014)。试论承德方言与普通话接近的历史成因。《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34 (4), 53-55。
- 董立龙、通讯员、吴立国、王金生 (2018)。滦平“普通话之乡”的历史记忆。《河北日报》。
- 郭锐 (2018)。早期北京话在汉语史和现代汉语研究中的重要性。《语言学论丛》, 58, 1-10。
- 何九盈 (2007)。《汉语三论》。语文出版社。
- 姜义华 (1993)。《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中华书局。
- 蒋绍愚 (2019)。北京话和普通话。《语言战略研究》, 6, 65-70。
- 李荣 (1990)。普通话与方言。《中国语文》, 5, 页数不详。
- 李新魁 (1980)。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 1, 44-52。
- 李宇明 (2003)。清末文字改革家论语言统一。《语言教学与研究》, 2, 1-11。
- 林焘 (1955)。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中国语文》, 8, 页数不详。
- 林焘 (1987)。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 3, 页数不详。
- 林焘 (2000)。《普通话和北京话》。语文出版社。
- 罗常培、吕叔湘 (1955)。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国语文》, 12, 页数不详。
- 闵庆万 (2021)。河北承德方言语音研究。《韩国语言文化研究》, 60, 页 3-20。
- 平田昌司 (2016)。《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 钱玄同 (1999)。《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力 (1991)。《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 吴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2002)。《吴汝纶全集》第 3 册。黄山书社。
- 吴宗济 (1992)。《现代汉语语音概要》。华语教学出版社。
-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 (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 赵元任著、吴宗济、赵新那编 (2002)。《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曾晓渝 (1991)。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66-74。
- 朱文熊 (1957)。《江苏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城市大学 (2012)。《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 2 版)。商务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16)。《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 史皓元、张艳红、单秀波 (2016)。“普通话”从何而来? ——清官话、京话和民初国语。《语言规划学研究》, 2, 5-21。